◆观 点

推进基层政府规则之治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农业税费的取消和新农村建设的开展，各种资源、补贴和项目资金纷纷下乡，基层政府的职能从“资源汲取”转变为“资源下乡、服务下乡”。但部分农村社会依然弥漫着对基层政府的不满和不信任，这不得不使我们思考，这些基层政府在实践着怎样的治理方式？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部分基层社会利益结构发生变化。税费改革之后，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与此同时，基层社会的利益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基层政府的重心转为向上级政府争取各类项目资源，缺乏回应乡村社会治理需求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对乡村社会治理往往遵循“不出事逻辑”。因此，基层政府和村民之间缺乏日常联结和互动机制。

其次，部分基层干部与地方势力结盟。税费改革后，部分基层干部与乡村社会关系日益松散，却与地方势力的关系日趋紧密。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大量项目资源下乡为乡村干部和地方势力提供了牟利的巨大空间，地方势力纷纷以工程承包人的身份承接各类自上而下的政策性资源。

再次，部分基层政府制度化治理能力缺失。由于基层政府的基础性权力弱小、相应的制度化治理能力缺失，基层政府不得不以强制性权力为基础，任意调动一切可用的权力手段，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无论是制度的还是非制度的。

最后，部分地区基层民主制度不足。目前，“选谁都一样”为部分村民所接受。在乡村关系离散化的状况下，部分民选干部被基层政府吸纳，并成为基层政府力量的延伸。现有农村民主制度未能将村民整合为可参与日常基层治理的有效力量，因此基层治理的规则之治有待进一步规划和建设。

部分基层政府的治理无规则表明，基层政府治理的深层问题在于权力运作的结构、规则和机制，而非仅在于机构或职能的设计。因此，我们应着重从基层政府的权力运行机制和运作结构上考虑如何实现基层政府的规则之治。

运用群众路线重塑基层权力结构。十八大以来，国家更加强调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并自上而下地展开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旨在改变当前基层政府治理中脱离群众的问题。如果基层干部脱离群众、不再依靠群众，而依靠与少数人的利益联盟，那么不仅公共治理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而且基层政府也将失去大众的信任和支持。

依靠国家制度化能力规范基层治理行为。基层政府基础性权力弱小的问题难以通过其自身的力量解决，只能通过国家的制度进行强制性规范。具体而言，国家对基层政府的制度化建设应旨在增强基层政府服务基层社会的治理能力，同时规范其非制度化权力，而非简单地增减或重设基层政府机构。

使完整的基层民主制度运作起来。只有选举而无其他制约机制，仍然无法防止公权力的滥用，也无法实现基层治理的规则之治。与部分基层干部结盟的地方势力正是利用选举成为影响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进而重构基层治理的权力和利益结构，这加剧了基层治理的去规则化。因此，实现完整的村民自治制度需与群众路线相结合。（2014年11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报》欧阳静）

技术进步和制度改革是增长的关键

中国经济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既是潜力，又是挑战。相当早的时候，增长模型就把生产力的提高、技术进步带来的增长当作一种增长的要素。后来又加进了制度，现在研究劳动和资本之外就是研究知识和制度。劳动力变成人力资本，资源变成资本，里面都包含着知识的要素。

当年有一个著名的悖论，那时候大家分析说美国有那么多资本，输出的产品一定是资本密集型的。结果，研究来研究去，发现美国出口的产品当中，劳动力工资成本占大头，是劳动密集型的。后来通过仔细研究包括理论的进步，发现原来美国的出口不是劳动密集型，是知识密集型，是人力资本密集型的。它出口的都是由大学毕业生生产出的东西，是人力资本生产出的东西，这就和附着在人身上的知识对应了起来。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今后确实还存在增长潜力。第一，现在都说劳动力供给减少了，人口红利没了。我认为，劳动力是一个被很多人用错的概念。中国劳动力总量再有5到6年就可能停止增长，中国的老龄化也逐步在提高，但是也有两个因素会抵消劳动力总量增长放缓的趋势。首先，中国还有30%甚至更多的劳动力是农业劳动力。他们的转移还远远没有完成。中国现在劳动力短缺，工资迅速上涨，不是因为劳动力转移完了，是因为制度上有缺陷阻碍了劳动力的转移。如果下一阶段中国能够真正重视农民工进城的问题，所谓的劳动力短缺就会得到缓解，而且能够基本保证我们未来10年、20年的劳动力基本供给。其次，中国这些年教育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教育条件有改善，尤其是硬件，改善得挺快。

第二，再讲资本。中国现在有点资本过剩，中国的储蓄比起可以用的投资来显得太多了，整个GDP的50%都被储蓄了起来。这个储蓄主要不是家庭储蓄，而是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储蓄起来就得投资，不投资就会变成外汇储备投到外国去。所以现在中国鼓励企业走出去，允许个人、企业利用更多的外汇到国外投资。

关键的问题还是技术进步和制度改革。中国过去30年没什么创新，这个很正常，西方发展200年了，中国刚开始，最初20年到30年就是学习、引进、消化、吸收、模仿。中国没有经过一定实际积累不可能有创新的能力。但是现在经过20年到30年，中国的企业越来越多走进前沿或者接近前沿了，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开始逐步具备创新能力。

这里特别要说的一点是，创新是一个很广义的概念，既包含科技创新，又包含其他方方面面的创新，特别是商业模式的创新，管理方法的创新，产品品牌的创新或者是销售渠道的创新。

然后是制度改革。总的来说，也许制度红利不像过去那么大，但是潜力仍然巨大。当然，这需要一系列的改革和政策调整。（2014年12月15日《经济参考报》樊纲）

◆纵 横

活力在“活”

“社会活力”的提出，乃中国眼下的必需。

大饥荒年代，陈云提出“开笼放雀”，救民于水火；“文革”浩劫后，万里们力挺小岗村“包产到户”，迎来“一年翻身，改变面貌”的局面；胡耀邦们平反了数以千万计的冤假错案，举国振奋人心大快；30多年前由邓小平、任仲夷、习仲勋、吴南山、梁湘们开创的“拓荒牛”模式，带给全国“小渔村效应”……无不证明释放社会活力的巨力。

《说文解字》上解“活”，本义为流水声。流水之“魅”，在于她的活泼、活跃，活蹦乱跳、活色生香，活生生、活脱脱，与死板、死硬、死呆八板、死气沉沉，正好相对。唯有社会的“活”、民众的“活”，才有社会的活力、国家的活力、民族的活力。“千口”之舌，不光用来吃饭，还要用来发声。

当承载“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牛仔裤、迪斯科，连同“靡靡之音”邓丽君、《乡恋》“沉渣泛起”之时，出版界则由严济慈、杜润生、丁学良、王岐山、邓朴方、汤一介们编纂出《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二十世纪文库》《中国文化书院文库》，一扫此前的“鸦雀无声”“万马齐喑”“千人一腔”，是真正的江海襟怀!

笔者之所以激赏《诗经·南风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诗句，就在于她提出了任何为政者都必须面对的“解愠”“阜民”两大课题。百姓有“愠”，是重要的“舆情”。及时采集，予以重视，即寻到了改革的指向与动力。解百姓之“愠”，正是激发社会活力的着力点，也即是改革的出发点与归宿。

必须认定，无论经济、精神领域，“活”是全方位的，不单是经济范畴的“活”，也是思想文化范畴的“活”。社会活力，牵涉社会组织，相当于经济领域中的“民企”。让经济充满活力，须让民企“活”；让社会全方位充满活力，须让社会组织“活”起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搞“自由市场”、“旅游开放”、“出国留学”、民办学校、私人医院……都曾经那么忧心忡忡，生怕会出大事，后来的事实表明，不都是好好的而且愈来愈好么？顶多是个“完善”的过程。民间固然不乏郭美美之流“挂羊头卖狗肉”钻政策空子，然而投此“鼠”可别伤了广大民众之“器”。

（2014年第25期《南风窗》符 号）

◆评 论

打通网上网下民意

从12月8日开始，网友可投票评选“国务院2014年十大政策”。作为国务院首次就推行政策的关注度进行的网络评选，在评选结束后，网友意见将会报送国务院有关领导，供决策参考。参与者还有机会进中南海，参加粉丝见面会。

这显然是国务院的一次民意收集动作，更准确地说，这是一种政策的社会效果评估。这使我们想起国务院近几年推动的政府绩效评估，特别是对各部委重大政策的第三方评估，其中也涉及民意收集，那是收集与政策密切相关人群的意见。网络投票是网上民意，绩效评估涉及网下民意，虽然收集渠道不同，但政府关注的是一样东西，即民意。

相信这不是有关部门与领导头脑发热的“忽然想到”，而是表明，政府对民意的价值与作用有了较深入认知，且能知而行之。民意是现代政治绕不开的东西，事关民众对政府施政的认同度。况且民意并非一堆杂碎，通过公开辩论，民意不仅能够反映公众的诉求，而且表达共同利益，完全符合“民主集中制”原则。

但是有时候我们收集民意的路径似乎是脱节的，有的部门喜欢听取网民意见，和他们交流和见面；有的人断言网络民意是民意泡沫，似乎更愿意面对面听取群众意见。网上收集民意成本低，效率高，但网民是否具备足够的代表性，不甚清楚。领导下基层，面对面听取民意，“眼见”可以修正“耳听”，但由于“样本”有限，所得民意也有可能失真。

民意虽然号称“多变”，但在若干领域，民意有其高度的稳定性。比如治霾、反腐总是强大的民意，在治霾成功、反腐见效前，此种民意不会有太大波动。这些稳定的民意，不管我们从何渠道收集，它就在那里。

对民意的获取其实不应有网上网下之分，关键只在于真实准确。要达到准确真实的目的，必须发展出一套民意调查技术与规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专业问题，其实也不必领导人亲自去收集、筛选民意。领导人真正要做的，是在掌握民意的基础上与公众进行沟通，争取大家的理解与赞同。

至于民意收集调查之类的事，可以交给专业机构去做。现代民主政治催生了民意调查行业，几十年来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一些声誉卓著的民意调查机构。比如盖洛普民意调查，在美国政治、商业、社会领域影响都很大。中国显然拥有巨大的民意调查市场，民意调查机构是否发达，可以反映相应的市场需求。

网上与网下民意的局限其实不是局限，时至今日，人类社会已经拥有对民意进行精准测量与评估的方法。从什么渠道收集民意，只是一个技术问题。网上网下都存在各种意见，但去伪存真，剩下的就是真正的民意。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一个让民意收集、调查、研究、表达大有用武之地的社会空间，才能使民意真正畅达。（2014年12月10日《长江日报》杨于泽）

◆史海钩沉

辛亥革命：无法告别的革命

在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中，近年来，有一倾向表现得非常明显：一些学者虽然肯定辛亥革命的道德正义性，但否认辛亥革命是当时必然的、正确的选择，从而彻底否定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与之相应的是，他们对晚清的改良和立宪运动寄予了深厚的同情，认为晚清的改良派与立宪派代表了中国前进的正确方向。这些观点，涉及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主流与本质的认识，有必要认真加以辨析。

辛亥革命是可以避免的吗？

一种观点认为，辛亥革命是完全可以避免而且应该避免的。其理由是：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成功都是非常偶然的，当时的中国完全可以选择另一条道路，即改良的道路。这一看法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任何革命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有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以来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变动的必然产物。中国的社会经济关系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开始发生根本性改变。19世纪60年代以后，清廷发起“自强”运动，洋务派兴办了一批军用工业，这是中国人最早经营的近代工业，但这批军用工业带有强烈的官办色彩，属于官僚资本的最初形态。真正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近代企业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那时，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开始投资于新式工业。这些企业虽然规模小、资金少，但都采用雇佣劳动，产品主要用于交换，以盈利为目的，因而已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随着它的力量的逐渐壮大，它必然会提出其政治上的要求，这就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准备了阶级基础。

其次，辛亥革命绝非某种偶然因素的结果，也不是某个或某些历史人物主观选择的结果。从世界范围看，从历史看，当政治败坏到难以维持正常统治的时候，当民众无法照常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辛亥革命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所面临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产物。当时中国的社会危机非常严重，革命的形势已经形成，清王朝灭亡的趋势已是无可挽回了。

总之，辛亥革命的爆发既有现实的原因，也有深厚的经济社会根源，是历史的必然。点燃革命之火的事件或人物可能具有偶然性，但革命本身则具有必然性。历史的必然性通常会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辛亥革命中固然充满了许多偶然性，但在这些偶然性的背后，有中国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的变动，有深刻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因此，以历史的偶然性来否定辛亥革命的必然性，是对历史的误读。

清末改良的道路是行得通的吗？

关于辛亥革命的另一种观点是：辛亥革命是不必要的，因为清政府已经在进行改革，这种改革完全可以把中国引上现代化的道路。清廷真的可以通过改良的道路把中国引上富强的道路吗？让我们追溯一下清廷为应对变局所做的“变革”。

清廷真正的变革是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之后出现的。自19世纪60年代起，清廷统治集团内部的洋务派在“自强求富”的旗号下，积极推动清廷在外交、军事、教育各领域的变革。凡此种种，较之以前进步是非常明显的。然而此种进步与当时西方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相比较，则仍然相形见绌。19世纪60至90年代，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俄国完成了农奴制改革；美国通过南北战争完成了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德国、意大利等实现了国家统一；日本完成了明治维新。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的变化仍然是小的并且与列强各国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进一步拉大。甲午一役，中国大败，彻底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它表明，旧的制度已经腐败，中国要实现富强复兴，就必须打破旧的体制，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制度。

1898年的戊戌变法可以说是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一次尝试。变法期间，一项项改革措施接连出台。然而变法只持续了103天就被迫中止。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发动政变，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日本“六君子”被杀，慈禧太后出来“训政”。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由慈禧太后主导的“新政”又开始了。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明确提出要学习西方的本源，即制度。在这之后的几年间，清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实施“新政”的上谕，其中最重要的变革，就是宣布“预备立宪”。1906年8月，清廷发布预备仿行宪政上谕。之后，立宪运动逐步展开。1908年7月，清廷颁布资政院章程，同年8月底，清廷公布9年预备立宪大纲，决定到1917年颁布宪法，实行立宪。然而，在离清廷预定的颁布宪法的时间还有6年的时候，革命爆发了。清廷推行“新政”的本意，原是振衰起弱，从此“富强”，外则讨好洋人，内则消弭革命，然而推行的结果，非但没能巩固其自身的统治，相反却加速了革命的到来。这是因为，一方面，清廷此次新政，毕竟是一次迟到的改革。另一方面，清廷尽管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不断进行改革，但这种改革始终是被动的、滞后的、消极的，并且是缺乏诚意的。

综上所述，从洋务运动开始，中经戊戌变法，到清末的“新政”，一次次的改良，又一次次的失败。随着清廷改革的深入，人们变革的要求不是得到了满足，而是变得更加强烈，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走上了革命救国的道路，他们的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在中国建立起一种西方式的共和制度，革命就这样成为历史的选择。所以，那种认为清廷完全可以把中国引向宪政之路的观点完全是一种脱离历史的想象。

辛亥革命延误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吗？

否定辛亥革命历史意义的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认为辛亥革命引发了中国后来一系列的动荡，延误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之相似的另一种表述是：辛亥革命打倒了清政府的权威，革命后又没有建立起新的权威，所以无法进行高度的社会动员，导致现代化进程中断。这种看法，同样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辛亥革命不仅没有延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相反却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首先，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在比较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孙中山先生第一次响亮地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并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集中反映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的崇高理想，特别是明确提出要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建立民主共和国。这是以往从未有过的政治理念，从而把民主主义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

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武昌起义成功后，中华民国建立了，清帝宣布退位，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从此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中国实现了从“君主”制向“共和”制的转变。用资产阶级的共和制度代替封建地主阶级的君主专制制度，这是历史的巨大进步。

第三，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开辟了道路。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旧制度，从而扫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障碍，革命后政府颁布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整个社会也都认为“破坏已终，建设方始”，因此出现了历时近十年的现代工业发展浪潮。而这个“黄金时代”的出现和形成的根本原因，是辛亥革命削弱了封建势力，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第四，辛亥革命开启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革命往往意味着摧毁旧的权威，也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变革的开始。在民国成立后的第一年间，连续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旧习俗的法令法规。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举措看似琐碎，却处处渗透着民主共和与人权平等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又随着法令的推行逐渐渗透到民间，使民主共和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整个社会也就呈现出一种新的气象。

第五，辛亥革命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中国自秦至清，尽管历代风尚各有不同，制度多有损益，但总体上保持了一致性，实行的都是君主专制制度，“皇权”始终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

第六，辛亥革命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探索了道路。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但它从反面证明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难以担当完成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历史性任务，不能解决中国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问题。另外，辛亥革命的目的是要在中国建立西方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但事实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必须寻找一条新路，去完成辛亥革命没有完成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务。

这样，辛亥革命的失败，推动先进中国人去探索中国社会发展的新道路，去完成辛亥志士未竟的事业，所以说辛亥革命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不容否定。（2014年第10期《思想理论教育导刊》欧阳军喜 于洋）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邮政编码：100091 总编辑：钟国兴 社长：王金龙 广告部电话：62805980 62806380 发行部电话：62806227兼传真 总编室电话：62805368 62806234 电子信箱：xuexishibao@126.com
定价：全年180元 邮发代号：1—267 国外发行代号：W3970 开户银行：建行北京中关村分行 户名：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 账号：2613000456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海工商广字0301号 承印：人民日报社印刷厂